略論馬建忠的外交思想

陳 三 井

一、引言
二、生平、教育及經歷
三、外交思想概述
四、結語

一、引 言

中國最早派遣學生留法，肄習國際公法與外交者，當首推馬建忠。馬氏早年曾肄業上海徐滙公學，於希臘、拉丁文暨英、法語言均曾奠下良好基礎，復奉派出國進修，三載於歐，「履西域，援西士，肄西文」，親炙西式新教育。

馬建忠受知於李鴻章，畢生事功與李有密切之關係。李氏在同光年間，負責對外交涉，一時名震中外，而於其一手培植之馬建忠自亦倚爲股肱，期望甚殷。時正值法越事起，馬建忠以招商局會辦身份，在上海刺探敵情，並擔任中法交涉之翻譯，居間傳遞消息，進而襄贊和議，於李鴻章政策之決定不無影響。

光緒初年，捻、回諸亂相繼削平，四方粗定，而中國外患日亟，馬建忠曾受西方文化之薰陶，又學有專長，當此之際，其外交思想與同時代之中國知識份子相較，有無新穎特殊之處？其對國際事務之見解，有無獨到之點？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二、生平、教育及經歷

馬建忠，字眉叔，譜名欽良，江蘇丹徒人，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正月初三日。① 與吳汝綸、陸潤庠、盛宣懷、黃遵憲等人差不多同時。兄弟五人，夭折者二，建忠排行最末。長兄建勳，字少良，見知於曾國荃，以禦太平軍有功，曾任淮軍糧臺。② 次兄相伯，單名良，又名建常，學貫中西，精拉丁文，早歲曾任駐日使館參贊，後入李鴻章幕，赴朝鮮襄助改革政事，編練新軍。歸國後，曾先後創辦震旦學院暨復旦公學，熱心教育。晚年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於抗戰大計貢獻良多。③ 堪稱一門才俊，表現不凡。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建忠以七歲之年，隨兄相伯入上海徐滙公學（為法國天主教會所辦）肄業，學名乾，字斯才。校長為義大利人晁德蒞（Angelo Zottoli），精漢學，並擅自然科學，建忠從其遊，除漢文之外，亦潛心於拉丁文字、希臘文及英法語言。④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首屆福州船廠學生出洋，建忠因李鴻章選派，以隨員兼法文翻譯身份同行。時諸生由華監督李鳳苞與洋監督日意格（Proper Giquel）率領，一行三十二人於三月三十一日（二月十七日）先乘船廠「濟安輪」赴香港，再於四月五日（二月二十二日）由香港搭西國公司船放洋西行。⑤ 同年五月十一日（三月廿八日）抵法國。馬建忠與文案陳季同均入巴黎政治學堂（Eco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修習國際公法與外交。⑥ 據馬氏上李鴻章函，其所肄習功課包括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辭等，每試輒列前茅。⑦ 至光緒五年（一八七九）七月九日（五月二十日），馬建忠在法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學士學位（Licencié

① 方豪先生根據「馬氏族譜」，曾考訂「馬相伯先生年譜」（張若谷編著）之錯誤，指出建忠生年並非道光二十四年。參閱方豪「馬相伯先生生日考及其他」，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頁2013—2016。

② 張若谷編著，「馬相伯先生年譜」（商務版，民國二十八年），頁4。又方豪「馬相伯先生事略」作湘軍糧臺，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頁2022。

③ 方豪，「馬相伯先生事略」，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頁2022—2025。

④ 馬建忠，適可齋紀言紀行（文海版），擬設繙譯書院，紀言卷四，頁22下；方豪，「馬建忠先生事略」，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頁2026—28。

⑤ 船政奏議彙編（臺灣大通書局），卷14，頁16。

⑥ 李緒武，清末船政學生之留歐教育，東方雜誌，復刊3卷1期，頁73。

⑦ 適可齋紀言紀行，卷2，頁4。

à l'ecole de droit). ⑧

早期中國留歐學生對於新環境之適應，頗為不易。有因健康不佳而病歿異國者，⑨ 有因故中途輟學者，有因西方繁華物質世界之引誘而偷竊入獄者。⑩ 但亦有如馬建忠、陳季同於巴黎社交圈內深受歡迎者。

馬建忠在巴黎曾先後出任郭嵩燾與曾紀澤之隨員。光緒四年（一八七八），郭嵩燾奉命兼使法國，駐法使署初設於羅馬王街第二十七號（27, Avenue du Roi de Rome），後改租達拉布街七十一號（71, Rue Delambre），樓三層，二十餘間，歲租約六千兩，即係馬建忠經手。⑪ 郭嵩燾抵巴黎向法總統麥克馬洪（maréchal de Mac-Mahon）呈遞國書，並往謝外部大臣時，亦帶馬建忠同行。⑫ 郭嵩燾所以對建忠特別照顧，主要是因李鴻章的推薦。李在致郭函中有云：

> 「馬郎中建忠志趣尙好，人亦聰明，法文法語俱精，現在官學講習交涉律例，可備就近驅策，儻能兼翻譯，又不誤所學，則兩益矣！」⑬

不久，郭嵩燾因與副使劉錫鴻齟齬不已，朝廷着一體解職，另發表曾紀澤繼任。曾在未赴任前，過天津與李鴻章晤談，得閱建忠上李相報告出洋功課函，又聞其年方二十有六，遂譽之為英材，因建忠不僅「精通法文，而華文函啓亦頗通暢」。⑭

建忠的法文不僅有李相與曾使等中國人自己的誇獎，亦同樣獲得法人的讚賞。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旅居中國的法國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曾以「十分

⑧ Henri 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Tome II, P. 499. 又方豪先生指建忠曾得博士學位歸（參閱馬建忠先生事略一文），汪一駒先生（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P. 80）則說建忠於一八七八年通過法國中學畢業會考文憑（Baccalaureat），不知何所據。

⑨ 如梁炳年之中暑病逝，見船政奏議彙編，卷16，頁8。

⑩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The Uni.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 81.

⑪ 郭廷以等編，郭嵩燾先生年譜(近史所專刊廿九)，下册，頁752。

⑫ 同上，頁753。

⑬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頁5—6。

⑭ 曾紀澤使西日記(文海版)，卷1，頁11。

聰明，法語講得極爲出色」稱許建忠。⑮當中法交涉期間，馬建忠擔任李鴻章之翻譯，法使寶海（Fréderic Albert Bourée）亦認爲馬氏「精通法語，翻譯學問靠得住」。⑯足見建忠的語文造詣當非徒擁虛名！

語文之高下，除先天秉賦及書本之講求外，通常皆得力於環境之磨鍊。建忠因係中國第一位留法學生，又爲公使隨員，與當地人士接觸，談論學問機會較多。又因他係天主教徒，且「美秀能文」，態度和藹可親，復擅長中國樂器，更兼容易適應新環境，因此頗受巴黎社交界之歡迎。⑰據建忠自述，他到巴黎後，「多與當道往還，而所最善者則有彼之所謂翰林院數人，專講算化格致諸學與夫各國興替之由，各國欽仰尊如北斗」。⑱語文的暢通與社交之歷鍊，是建忠日後從事奔走，擔任穿針引線角色的條件。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三月間，馬建忠學成歸國，赴津謁李鴻章，李以其「出洋三年，勤學好問」，請旨賞建忠二品銜，發交總理衙門存記，備出使之用。李在奏保摺中說，建忠「精通法國語言文字，兼習科學之學，志趣端正，心地明敏，頗堪造就」。又引李鳳苞語，稱其「持躬謹愼，爲外人所敬重，允稱品學兼優，或備充出使人員，或備諮詢例案，以與洋員辯論，均堪勝任」。又謂其「華學旣有根底，西學又有心得，歷試以事，均能折衷剖析，不激不隨，凡過津各國公使領事無不同聲引重，實堪勝專對之選」。⑲然以未受總署重視，鴻章乃先委以董理天津水師營務處，辦理海軍事務。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建忠隨德將漢納根（Major Von Hanneken）乘鎭海艦勘旅順砲臺，並視察淘金採煤等新事業。同年六月，奉李相面諭至香港、西貢、新加坡、加爾各答等地，與英人議鴉片專賣事，以期寓禁於征。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朝鮮壬申事變起，建忠隨吳長慶渡韓，助平朝鮮內亂，誘執大院君，並使

---

⑮ Cordier, P. 499.

⑯ 中法越南交涉檔(近史所編)，第2冊，頁723。

⑰ 同註⑮。

⑱ 適可齋紀言紀行，卷2，頁4。

⑲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頁37，奏保馬建忠片。

朝鮮與日使花房義質訂約。這是建忠從事外交，初展長才所建的第一功。鴻章請旨賞戴花翎，以海關道存記擢用，惟吏部以章程不符議駁。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李鴻章因招商局辦理有年，成效不著，以建忠爲會辦，加以整頓。適中法戰起，建忠以法艦將封鎖長江，亟與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議定，凡招商局船皆懸掛美旗，名爲出售，實則暫租，頗受時論攻訐，初也不獲李氏諒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義和團亂作，建忠於病中奉命趕譯俄廷致李鴻章長電，以操勞過度，遂致長眠不起。死時年僅五十五歲。

三、外交思想概述

道咸兩朝中國朝野的外交知識十分貧乏，即使清醒人士亦甚缺乏國際常識。㉑這種不知彼的現象，正如澳門月報所記：「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㉒郭嵩燾亦嘆謂：「中國與西夷交援二十餘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猶謂國有人乎？」㉓其後由於對外迭遭羞辱，若干開明之士始著書立說，介紹西洋知識，國人對外的若干錯誤觀念因而獲得改正，也漸對萬國公法感到興趣，並開始重視主權的觀念與乎具備相當的世界眼光。㉔

馬建忠生前留下著作不豐，除專談中文文法之「馬氏文通」外，僅刊行「適可齋紀言紀行」一書，而其中紀言部分只四卷，欲由此對馬建忠之思想，特別是其外交觀念作一全盤性之瞭解，似覺材料不足。故以下僅就交涉之道，論出使之才兩方面分別作一概述。

(一)交涉之道

交涉卽外交之舊稱，乃國與國接觸、談判的總名。建忠所就讀之巴黎政治學院，本爲法國培養政治與外交人才之最高學府，素來講求與交涉有關之學問，與乎隨

⑳ 同上，奏稿卷49，頁52。

㉑ 王爾敏，道咸兩朝中國朝野之外交知識，見「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171。

㉒ 魏源，海國圖志，卷81，夷情備采上，頁2。

㉓ 陶風樓藏名賢手札，第5册，頁535。

㉔ 王爾敏，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見「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182—212。

時達變之才識，建忠於此錯綜複雜之學問自予特別重視。

過去中國與西洋交涉時或被欺矇，建忠認爲此非由「華人之智短才疏」，而係「名不揚，學不彰，不足以服之」㉕的緣故，也是「深閉固拒」外交所造成的後果。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建忠於巴黎復書友人，除詳述西方交涉源流外，並指出西方「所爭交涉之事，祇關一國之安危，非係歐洲之均勢也。夫歐洲列國壤地毘連，雖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獨斷，然保無有狡焉思啓者乘間抵隙，以爲與國虞，於是諸列國申盟要言，以强弱相恤，大小相維，成一均勢之局，卽戰國合縱連横之說，名異而事同者也。而歐洲自勝朝之末，以迄於今，交涉之道專主於此」。㉖

以列强分立的西方比擬春秋戰國，馮桂芬㉗、殷兆鏞㉘、許克勤㉙、項藻馨㉚等人早已論及，不待馬氏始明。卽於均勢思想，建忠之見解也並未超越黃遵憲㉛、項藻馨㉜諸人。

國與國交涉的憑藉厥爲國際法，其時又稱爲萬國公法。西方之所謂公法，不過是國際間縱横家捭闔之工具而已。涂儒翯早論及此，他說：

> 「公以濟私，莫巧於公法。拏坡侖（卽拿破崙）之强也，公法自在，誰得執而訾之。琉球越南之滅，誰其出而禁之。朝鮮之搦戰，誰與取而評之。是故方其弱則公而非私，旣借法以便己。强則有私無公，又借法以陵人。

㉕ 適可齋紀言紀行，卷2，頁4。

㉖ 同上，頁9。

㉗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頁66：「今海外諸夷，一春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卽風氣亦相近焉。」

㉘ 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1，頁9下，殷兆鏞密陳夷務疏：「按泰西大小各國以數十計，而不能統一於一尊。最大者爲俄爲英爲法爲美，而普魯士後出，亦頡頏其間，與中土從前之戰國絕相似。」

㉙ 中西時務類考，卷3，頁34上，許克勤，德奧義合縱，俄法連衡論：「嘗謂歐西諸國大小相維，迭爲雄長，一春秋列國之勢也。而邇年以來，德奧義合縱，俄法連横，則又將有大戰國之機。」

㉚ 項藻馨：「故就天下大勢而論，爲春秋時一大戰國。」見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年，卷上，頁20。

㉛ 黃遵憲說：「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横，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强，比之羅馬統一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卷15上，頁1上。

㉜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72，頁9上至13下，項藻馨，破歐洲五國合縱連橫策：「蓋俄英法諸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發也。……不特兼併難，卽臣屬亦不易。」

然則公法故策士縱橫之術，其公其私，無難判也。」㉝

萬國公法實際上常淪爲强凌弱的一項護身符，例如陳虬說：

「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即警懼張皇，……。蓋一國强盛過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貽患於鄰國也。」㉞

當時，馬建忠也意識到公法並不足恃，他說：

「泰西之講公法者，發議盈廷，非說理之不明，實所利之各異，以致源同派別，分立門戶，上下數十家，莫衷一是。於是辦交涉者，不過藉口於公法以曲循其私。」㉟

國與國交涉的結果厥爲條約。建忠進一步指出條約亦不足恃。他說：

「交涉之道，始以並吞相尙而不明，繼以譎辯相欺而復失，終以均勢相維而信未孚，徒恃此載在盟府一、二無足輕重之虛文，安足以修和於罔替」。㊱

辦交涉，當以人才最爲重要。時代不同，所需人才應以能「達變應時」爲基本。馬建忠說：

「交涉之源流既已因時而遞變，卽交涉之才識尤貴達變以應時，此交涉之道所以存乎其人也。……爲之國者得一、二能臣坐鎭於內，遣使他國以窺其情僞而詳報之，卽足以默定機宜而爲之因應，間有遣一使而從者數十，務與彼都士大夫交接，善爲鉤距，以得事情」。㊲

建忠除注重與「彼都士大夫交接」的傳統式外交外，鑑於時代迥異，「今也開新報之禁而淸議愈多，重議院之權而民情可達，輪舟火道之星羅棊布，往來便而俗尙則計日而更，水汽機之雷動風行，工商裕而財源則與時遞長，所以辦交涉者非若昔時，惟窺探一、二人之心思可以坐操勝算。又必洞悉他國民情之好惡，俗尙之從

㉝ 沅湘通藝錄，卷3，頁55。

㉞ 經世博議，卷4，頁15。

㉟ 適可齋紀言紀行，頁12。

㊱ 同上，頁11。

㊲ 同上，頁12下。

違，與夫地利之饒瘠，始足以立和議，設商約，定稅則，而不爲人所愚弄」，㊳因此做法也有不同。

交涉之道，首先要知彼知己。知彼並不容易，故建忠主張兼顧彼邦的議院與報紙輿論，其用意在「閱彼新報以揣其要旨，入彼議院以察其變遷，上結紳衿默觀動靜，下連商賈隱相機宜」。知彼之外，知己的工夫也不可忽略。建忠認爲「知我之所長，尤宜知我之所短，知我之所長故掩之以待時而發，知我之所短故彰之，可因奮而更。既已知我知彼矣，尤宜先定所向，所向旣定，而後心無旁營，力無旁貸，所謀則濟，所舉則成。」㊴

建忠所論，雖未必發前人之所未發，但係融合學識與親身觀察所得，非徒託空言者可比。時至今日，這些原則仍屬不易之眞理。

中國過去備嘗「深閉固拒」外交的暗虧，因此建忠亟言敦睦邦交的重要性。他說：

> 「自均勢之局定，而列國安危所繫莫大於邦交，第交不可無，而擇亦宜愼。」㊵

敦睦邦交，爭取與國固然重要，但選擇尤宜謹愼，否則引狼入室，噬臍莫及！建忠以英國爲例，指出「英人之交，惟利是圖，利在則友，利亡則寇，列國之結懽於英者大抵無實德之可圖，只求其不助之耳。」最後建忠慨然嘆謂：「今之不善交者莫土（耳其）人，……處遞變之時，不因時而與之俱變，內無定向，而知變之士寡，外無友邦而應變之方少。」㊶此實亦當時中國之情景，建忠特引喻寫照，可謂一「有心人」！

「以夷制夷」觀念的進一步發展，是結盟政策的實行。一般而言，敦睦邦交僅是外交原則的運用，結盟則是其具體之舉措。建忠並不摒棄結盟，他說：

> 「天下事衆擎則易舉，孤掌則難鳴，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

㊳ 同上，頁12。

㊴ 同上，頁13。

㊵ 同上，頁14。

㊶ 同上，頁14下。

而建爲國，則必小事大，大字小，憂危與共，戰守相援，而勢乃不孤。」[42]

他以克里米亞之戰爲例，認爲「英得法助，故奏績於黑海之濱，此皆邦交之實有所援也。」[43]足見結盟之重要。

(二)論出使人才

郭嵩燾有云：「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44]因此洋務人才自來受到開明之士的重視，當然其最初目的僅在制外夷。例如魏源曾謂：「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夷館，翻夷書始。」[45]咸豐九年（一八五九），郭嵩燾奏陳海防與馭夷之道，有鑑於外夷語言文字之重要，首請於廣東、上海等處訪求諳習之人，資送來京，使轉相傳習。[46]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同文館之成立，實具催生作用。

馮桂芬也注意到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必要，主張設館培養。他說：

> 「夫通習西語西文，例所不禁，亦勢所不可少。與其使市井無賴獨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禮之人共能之。前見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招八旗學生，聘西人敎習諸國語言文字，與漢敎習相輔而行。此舉最爲善法，行之旣久，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異敏之質出於其中。然後得西人之要領而馭之，綏靖邊陲之原本，實在於是。」[47]

馮氏議論的歸結欲在上海、廣州兩口設立同文館，招十五歲以下資質優秀文童入館學習。他的意見，立即引起地方大吏的重視。江蘇巡撫李鴻章受其直接影響，而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在上海創設了語言文字學館，或稱上海廣方言館。接着廣州也有同樣的學館成立。[48]

---

[42] 同上，頁13下至頁14。

[43] 同上，頁14。

[44] 養知書屋文集，卷11，頁11—13。

[45] 海國圖志，卷3，籌海篇3，議戰，頁1下。

[46] 郭嵩燾先生年譜，上册，頁211—12。

[47] 校邠廬抗議，卷下，頁100。

[48] 呂實强，馮桂芬的政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四卷，第二期。

同文舘，上海廣方言舘的設立，似僅偏重於語言文字的訓練，且局限於基層外交人員之養成，距離專業化外交人才之培養目標尚遠。李鴻章嘗論，出使外洋，必須博學多識，知大體，而尤以通知西洋語言文字爲第一要義。㊾郭嵩燾亦謂，出使之才有三要件：一曰應對周旋，善於辭令，二曰應權達變，見事機警，三曰通達古今，博學多能。㊿所論雖中肯棨，但仍嫌籠統粗略，了無新意。

馬建忠鑑於華人「從古不與外人相聞問，未讀其史，未習其語」，曾有設立「出使學堂」之建議，其見解之新穎，思想之週密，設計之完善，堪稱近代中國史上第一人。他建議在上海設一學院專門培養出使人才。凡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一、二歲，身家清白，讀畢五經四書，文理粗通，聰俊子弟均在收錄之列。招考之日，試以策論，或與之名臣奏議一段，使演譯其旨，或從而駁辨之，以詞意淸順，氣機暢達爲主。每年錄取十名，以三年爲限。第一年課以法國、拉丁語言，第二年課以文義，第三年課以詞章，各有呈限。正課之外，仍兼華文，史鑑不得偏廢，又時爲講解外史以及度數之學，格致之功皆當領略一、二，以爲異日酬應之資。每年有考，劣者革出，優者方准進讀。三年後總考選錄者，咨送總署或內留當差，或外放隨員。如是者試用一年，此一年中每人仍自讀英文並法國律例摘要，以備後二年課讀之功。一年期滿由所隨使臣出考語，送至巴黎使署學舘內，仿英人在京都設立領事翻譯學舘之意，學習二年。入舘之初，先將每生試用一年中所課略爲考問，以觀其荒熟。荒則責令重學，熟則進以二年正課。此二年中所講者公法律例、條約、理財，賦稅以及各國交涉來往公牘，所課者法文與華文公牘，英普二國語言。二年期滿，乃彙考咨送總署或內留爲司官，或外遣爲三等參贊。如是首尾六年，所謂教導有方也，雖於西學至粗至淺而始基立矣！

此外，其前之升用者，試以言，而後之升爲二等、頭等參贊以及公使之類，則試以事。自爲學生以至爲參贊，歷六年之久，其人之才品亦旣昭著，而三年文字約以學規，以困其心志。一年試用寬其約束，以觀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後，復令困養一年，使凡年少氣盛、狂傲不羈之習，藉使舘之差委以銷磨變化之，而後二年之

㊾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頁17—18。

㊿ 淸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 1 ，頁35。

功專習西學，寬立期限，嚴督課程，得以虛心下氣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濫用之弊。雖只歲選十人以讀其文字，更閱六年而方能造就不過十之二而已，然而不出十年，風氣開而士習變，不但使署無才難之嘆，且先以正業羣經加之，時習孔教根本體立用行，日後或可內調以贊國政，未必不出乎此，此卽所謂「姑卽不必先行者，而設一可以先行之法」也。㉛

建忠此一名爲出使學堂，實則類似外交學院的建議，雖屬初步構想，但先肄習語文，繼攻專業，循序漸進，顧慮週全，不急燥求功；雖用心西學，仍不偏廢華學，故不僅爲出使而設，亦爲內政而求，一舉兩得；且訂有期限，嚴督課程，嚴格考求，實有獨到之處。惜未被採納實施。

除「出使學堂」之具體建議外，建忠縱論西方交涉長才，最爲推崇意大利的加爭爾（卽加富爾，Camillo Cavour）、普魯士的璧斯瑪（卽俾斯麥，Otto Bismarck）、法國的大意郞（卽塔雷龍，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俄國之加且高弗（Alexandre Gortchakoff）、英國的巴末司東（卽帕麥司頓，Henry John Palmerston）、以及奧國的墨代直客之（卽梅特涅，Metternich）。他指出：

> 「數公者先皆久遊列國，或充公使之選，或爲遊覽之娛，一旦身入機府，他國之民情俗尙瞭如指掌，復得出使之臣時傳消息，雖千里如一室矣！」㉜

談及掄選使才之標準，馬建忠主張理用兼備，庶可泛應而曲當。他說：

> 「當乎事之來也，或援文起例，或考古證今，或假公法以求全。事同而情異，則考其國制國律以別其微茫，事異而境同，則察其地理地宜以窮其意委。每有交涉立約之事，所定不過數十款，而動涉歲年方可蕆事，非此數十款難以遽訂，亦以未訂之先，援公法證往事，合兩國之體制律例與其險阻物宜，無不悉心參究以求夫至當。」㉝

㉛ 適可齋紀言紀行，頁23—4。

㉜ 同上，頁12—3。

㉝ 同上，頁15上。

馬建忠並主張仿照歐洲各國辦法，錄用「其人可以肆應，而家道苦寒及出身微賤者」充任使才，因為「富豪子弟性率浮躁，使往與國，不通語言，不習風土，心厭公事而不考求，身擁厚貲可供酬應，以此援班遷升，烏能勝任？」㊹

建忠十分重視出使之才，一方面主張選擇要嚴格，「以交涉實學嚴加考覈，庶幾使館無濫竽之輩，行人無辱命之虞」，一方面強調必須教導有方與之配合。他說，出使之未得其人，乃「養之未盡其道」，所以要「重祿俸以養其志，嚴考校以求其才，然後即以所取之人專辦交涉，無間內外悉資熟手，庶幾遇大事有知變應變之方，足以折服衆人之意氣，而捍衞吾國之利權矣！」㊺

由上所述，建忠瞭然於中國自身所處國際地位，憬悟於中國並非沒有人才，而係人才未經培養訓練，所以亟力倡設「出使學堂」，主張嚴選嚴督，培養專業化、具國際眼光之外交人員，以應付國際壇坫上折衝樽俎之需。在馬建忠的構想中，培養與訓練專業化的外交人員只不過是一種方法與手段，其最終目的，乃在捍衞我國各種利權，進而爭取國際上之平等地位。

四、結　　語

清季就接受西方新知識而言，直接受西方教育薰陶人物如容閎、嚴復、馬建忠等，為數雖少，但能有創見性的理論，可以說是時代的先知。惜回國後，他們多數變成新事業的專家，或政府文武官員，或洋商買辦，而較少在政治上提出新見解，在思想界留下紀錄者。㊻以馬建忠為例，他回國後即變成李鴻章的私人外交幕僚，並襄辦各種洋務新猷，而未能充分學以致用，對當時中國所處地位提出高瞻遠矚的原則性看法與具體可行的因應對策，更未發揮所長，獨當一面，實際擔任折衝樽俎的重任。這是很可惋惜的事情。

平心而言，馬建忠的外交思想，除「出使學堂」之建議外，無論其對西方的認識，或於均勢思想、交涉之道的見解，較之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如黃遵憲、馮桂

㊹ 同上，頁16。

㊺ 同上，頁20。

㊻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15—6。

芬、項藻馨、陳虬等人，並無特殊新穎之處。這可以有兩點解釋：第一，建忠的思想主要見之於光緒三、四年間的「上李相伯言出洋功課書」、「巴黎復友人書」、「馬賽復友人書」等篇中，而這都是初到法國後不久所論者；由於接觸西方社會的時間不長，觀察不多，又缺乏實際政治歷練、體驗不深，這是可以理解之事。建忠所論仍以國內智識底子居多，自甚難超越同時代人物見解之範圍。第二，建忠回國後，即使歷練較多，思想更爲成熟，見解更加高超，惟苦無新紀錄留下，自不得不以其早年見解爲見解，縱有以管窺天之弊，亦爲莫可奈何之事！

建忠受過西方文化薰陶，精通外國語文，對西洋各國政情亦有相當之瞭解，可謂「才堪出使大任，勝專對之選」，於清季亟需肆應人才之際，本可脫穎而出，獲得重用，結果反而長才未展，鬱鬱不得其志，何以故？其間牽涉到朝廷用人制度問題。蓋科擧未廢之時，一切以傳統功名爲拔擢進身之階，建忠雖有洋功名，但並非擧人、進士出身，以一個讀洋書、念洋文，與洋人接觸的「邊際人」（marginal man），處身於一個迭遭外人侵略，排洋仇敎，思想保守，風氣未開的社會，其不受排擠、詬忌者幾希！何能再奢談脫穎而出，破格起用。馬建忠的遭遇，不過是中國在肆應西力衝擊，自我調整（self-adjusting）過程中，千百個事例的一種典型而已。